

百年追求的
現實與理想

三代 臺灣人



策畫・台灣研究基金會

黃煌雄 — 黃富三 — 吳密察 — 蔡石山 — 吳文星 — 邱士杰
陳佳宏 — 林瓊華 — 劉士永 — 許雪姬 — 謝國興 — 薛化元
蕭阿勤 — 吳乃德 — 許維德 — 黃向成 — 著

中研院人文社會聯圖



3 0600 01 089595 2

近年台灣研究基金會策畫舉辦了三次研討會，「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先覺者的精神遺產」、「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爭取民主的年代」，其中十七篇論文收錄於《三代臺灣人》。三次研討會分別聚焦於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一九四〇——五〇年代、一九七〇——八〇年代三個關鍵的時代，探討臺灣三個世代先輩們與時代奮鬥的歷史。從某個意義來看，可說立體地雕刻出百年臺灣人的精神面貌與歷史發展的軌跡。

「百年追求」的三代臺灣人——蔣渭水世代、李登輝世代和黨外世代，歷經三個時代的演變，擘畫出百年臺灣的基本圖像。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蔣渭水世代，譜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黃金十年；黨外世代則為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爭取民主、成果豐碩的年代；李登輝世代著眼於歷史的斷裂與敏感，從皇民化到二二八，深沉地勾畫臺灣的悲愴年代。每一個世代都有回應自己所生存世界的方式，而這些回應夾雜著挑戰與想像。

本書是第一本從廣泛視角與觀點探討百年臺灣歷史脈絡的鉅著，執筆的學者專家包括老、中、青三個世代的臺灣近代史研究者，從中研院臺史所到各大學臺灣文史所，可謂濟濟多士，是百年臺灣此一歷史命題罕見的規模與格局。



00580

9 789869 532297



讀書共和國

www.bookrep.com.tw

ISBN 978-986-95322-9-7 定價 580 元

策畫 台灣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 江東亮

編輯委員會

召集人 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國史館館長)

委員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何義麟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許佩賢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所長)

李福鐘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所長)

執編 陳怡蓉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編輯委員簡介

吳密察

1956年生，臺南縣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東洋史專攻博士課程修了退學。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成功大學臺文系教授。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國史館館長。研究領域：臺灣近代史、日本近代史、臺灣史料論。主要著作：《臺灣近代史研究》等。

許雪姬

澎湖人，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1984-2002年服務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迄今(2017)在臺灣史研究所任職。研究主題為清代制度史、家族史、海外臺灣人史等。

何義麟

東京大學學術博士，現任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稻鄉，2006)；《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五南，2015)。

許佩賢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專攻臺灣教育史。著有《殖民地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衛城，2015年)、《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東村，2012年)等書。

李福鐘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專長戰後臺灣史、二十世紀中國史。

播種者

三十年了
一萬多個日子
穿過戒嚴的陰影
走向民主
一個守護台灣精神的園地
一間凝聚世代人才溫暖的窩
一張孕育總統直選的長桌
以及
從費邊社到LES的啟示與呼喚
為亞洲與東方
擘劃一所二十一世紀台研會到TSE的學術殿堂
訴說著台研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733.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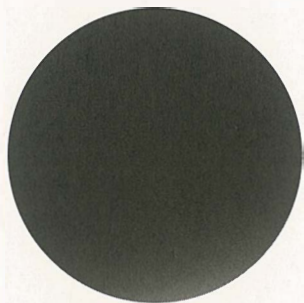
494

2017

中研院人文社會聯圖



3 0600 01 089595 2



百年追求的
現實與理想

三代 臺灣人



· 655131220

謹以本書紀念台灣研究基金會成立三十週年

目次

總序 黃煌雄 一大幸事與盛事	0
推薦序 陳芳明 臺灣歷史研究的新視野	0
推薦序 吳密察 百年來的臺灣歷史與臺灣人的精神面貌	1

【先覺者的黃金十年：蔣渭水世代】

黃煌雄 蔣渭水的歷史遺產	0
黃富三 林獻堂的內心世界探微——變色龍嗎？	1
吳密察 「內地延長主義」與殖民地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啟動	3
蔡石山 一九二〇年代全球社會主義的興起與臺灣的農民運動	8
吳文星 平等、自主、普及——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先賢的教育要求	9

【臺灣的悲愴年代：李登輝世代】

導論：黃煌雄 臺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	1
--------------------------	---

邱士杰 「轉向」之後——試論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

陳佳宏 二戰結束前後「半山」權力角色之分析 2 0 5

林瓊華 戰後臺灣左翼者進入中國前夕的政治理想與失落——以創刊香港的

《新臺灣叢刊》為析例 2 4 4

劉士永 一九三〇—一九七〇年代間從社會參與遁入臨床的臺灣醫界菁英 2 7 5

許雪姬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 3 0 3

謝國興 雙元繼承與合軌——從產業經營看一九三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
經濟 3 4 3

【爭取民主的年代：黨外世代】

薛化元 一九五〇年代臺灣的政治改革主張——以《自由中國》為例 3 8 0

蕭阿勤 「去流亡」的文化政治——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的回歸現實世代、文
學、與歷史 4 0 2

吳乃德 美麗島的資產 4 4 0

許維德 國族主義運動中的民主訴求——以解嚴前美國臺獨運動之相關論述

為中心 4 5 7

總結：黃煌雄、黃向成 論焚而不燬的黨外精神

4 8 7

「去流亡」的文化政治——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的 回歸現實世代、文學、與歷史¹

蕭阿勤

問題緣起與研究重點

戰後的臺灣，在一九七〇年代才開始發生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這個十年，對於當時至今的臺灣政治、文化的影響相當大，因此可視為戰後臺灣歷史上的軸心時期（the axial age）。²當時有許多因素帶來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而七〇年代初臺灣遭受的嚴重的外交挫折，是相當關鍵的因素。這些外交挫折，包括與日本爭奪釣魚臺列嶼而失敗（一九六九—一九七一）、臺灣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喪失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一九七一）、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簽訂「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一九七二）、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與臺灣斷交（一九七二）等。

臺灣在七〇年代初的變局中，一股挑戰既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社會新力量，也逐漸形成。這股力量主要是當時大約二十到四十幾歲之間、屬於「戰後世代」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有屬於本省籍的，也有屬於外省籍的。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即使不在臺灣出生，也幾乎都在戰後的臺灣成長。他們接受國民黨體制的教育，因此都懷有相當程度的中國認同。他們在六〇年代成長時，大多也都深受當時流行的「現代化」思潮影響，因此認為中國（指做為「自由中國」的臺灣，或者他們想像中未來統一的中國）要富強，那麼政治、社會、文化的現代化，是應該追求的最重要目標。七〇年代初，這些為數眾多的年輕知識分子受到臺灣外交挫敗的刺激，因而覺醒轉變。他們反省批判國民黨統治下臺灣社會瀰漫的「流亡」心態，認為不應該一味懷念或宣誇過去中國大陸的一切。他們領悟到：知識分子應該深入認識臺灣社會，並且將自我與更廣大的社會現實聯繫起來。他們積極要求社會改革

與政治民主，並且呼籲要回歸鄉土文化。因此我用「回歸現實世代」來綜括指稱這些自覺地批判、揚棄流亡心態的廣泛的年輕人，尤其是其中積極挑戰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的活躍分子。這個回歸現實世代，在當時政治與文化轉變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也足以稱為戰後至今臺灣歷史的「軸心世代」(the axial generation)。他們追求的政治革新與文化創新，充滿「去流亡」的傾向。

在回歸現實世代當中，本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相當強調臺灣獨特的歷史與文化。他們特別關注在政治上相當敏感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渴望瞭解他們自己的上一代被殖民與反抗殖民的真正經驗。日本統治臺灣半世紀，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近代國家的統治模式，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也從事許多現代化的建設。臺灣人的知識階層透過日本，開始大量接觸到源自於西方的現代政治思潮與文化。中國自一九一一年孫中山革命而推翻滿清政府之後的政治變化，以及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新文化發展，也鼓舞許多心懷「祖國」的臺灣人知識分子。一九二〇年，臺灣人的知識分子開始組織起來，提倡臺灣人的自主意識，企圖爭取被殖民者的平等與權利。這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的開始。不過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不管是溫和的或激進的臺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活動，都已受到壓制而幾乎消失。

另一方面，一九二〇年之後，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出現的同時，許多臺灣人知識分子也開始討論殖民統治下臺灣人的語言問題與文學的角色。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文學如何能促進被殖民的同胞覺醒與文化的提升，以及哪一種文學寫作的語言可以更有效達成這種目的。一九二〇年代初，一些反殖民的臺灣知識分子批判臺灣傳統知識階層用中國「文言文」創作的古典文學，呼籲臺灣人作家學習中國五四運動後流行的「白話文」，創作「白話文學」。一九三〇年代初，一些臺灣知識分子更進一步提倡用臺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臺灣話」或「臺語」）創作「鄉土文學」。由於上述的這些鼓吹提倡，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創作的現代文學或「新文學」開始發展。

在回歸現實世代當中，致力於挖掘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新文學歷史的，主要是文化界的本省籍年輕知識分子。至於努力發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的，則主要是本省籍年輕一代的反國民黨的政治異議分子。一九四七年發生本省人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二二八事件」之後，歷經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白色恐怖」的政

治肅清，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的二十年左右期間，各種對國民黨威權統治與文化意識型態的公開挑戰，都歸於失敗。到了一九七〇年，這種情形開始逐漸改變。一九六九年底，本省籍的黃信介（一九二八—一九九九）與康寧祥（一九三八—），分別當選臺北市議員或立法委員，開啟了七〇年代以本省人為主的政治反對運動。黃信介、康寧祥所領導的這些政治異議分子，被稱為「黨外」人士，而他們所進行政治反對運動，則被稱為「黨外運動」。「黨外」指「在國民黨之外」、「不屬於國民黨的」。從七〇年代初開始，黨外對國民黨的挑戰力量逐漸壯大。當時追隨黃信介與康寧祥的領導而投入黨外運動的，正是眾多回歸現實世代的成員。這些覺醒的年輕知識分子，被稱為「黨外新生代」。

文化界的本省籍年輕知識分子挖掘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新文學，以及黨外新生代發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目的都在於重新認識臺灣的過去，以理解現在而規劃未來，涉及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與認同（identity）的建構。當時另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是鄉土文學的發展。主要的鄉土文學作家都是本省人，而重要的提倡者則包括本、外省人。雖然也有不少年紀較大、屬於上一代的本、外省知識分子支持鄉土文學，但是鄉土文學作家、提倡者、讀者，主要是屬於回歸現實世代的年輕知識分子。鄉土文學作家與提倡者，批判臺灣社會所瀰漫的流亡心態，強調文學作品應該具有民族性，描寫社會現實。上述文化界的本省籍年輕知識分子或黨外新生代對於日據時期臺灣歷史的建構，以及鄉土文學作家與提倡者的文學理念，都顯示相當程度的中國認同。³他們與其他回歸現實世代的年輕知識分子類似，在理解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或者理解日據時期的臺灣歷史時，都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主題、關於中國人、中華民族過去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這個歷史敘事的要素見表一），⁴他們將這些政治、經濟、文化問題或日據時期的臺灣歷史，放到這個敘事模式的「情節」（plot）中去理解，視為這個情節發展的一部分。

表一：「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

敘事者	中國人、中華民族
時間的演進	十九世紀中期之後近百年以來
中心主題	中國民族主義：中國追求主權國家獨立自主的建國奮鬥—— 反外國強權的政治侵略 反外國強權的經濟侵略 反外國強權的文化侵略
情節	開始：傳統中國的積弱不振與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外國強權的欺凌 中間：締造民國共和體制的革命、建國的努力與挫折、外國強權的壓迫侵略 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抵抗外國強權的欺凌，追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獨立自主發展與富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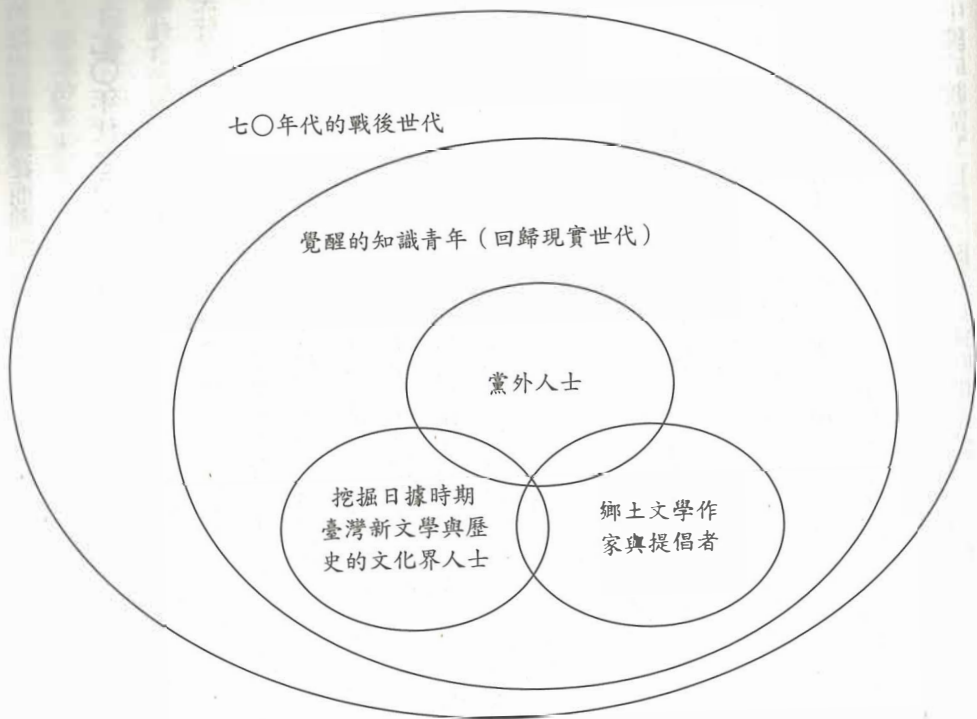
本文討論的主要對象，是回歸現實世代當中與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文化建構最密切相關的三群成員，亦即上述發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與支持者，以及黨外新生代（見圖一）。筆者分析的焦點，在於他們的世代認同、歷史敘事與社會行動三者的密切關係。從本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回歸現實世代的這三群成員，仍然具有清楚的中國認同，但是他們的文學活動與歷史建構，逐漸突破他們在成長期所接受的「現代中國」視野，關注「鄉土臺灣」的過去與現在，思考臺灣的未來。他們的文學活動與歷史建構，是一種「去流亡」的文化政治，不僅對七〇年代的文化與政治的變遷有重大影響，也形成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文化建構的重要基礎。因此探討回歸現實世代當中這三群成員的文學活動與歷史建構，對於我們瞭解晚近臺灣文化與政治的變遷，尤其是「本土化」、「臺灣化」的趨勢，相當重要。⁵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中國)民族化」

在七〇年代蓬勃發展的回歸鄉土潮流中，回歸現實世代的年輕知識分子重新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當時社會上占優勢的理解方式認為：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發展是一九二〇年代之後臺灣知識分子抗日的「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是受到祖國（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所產生，因此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部分；而當時臺灣新文學作家也是抗日並認同祖國的，他們文學創作的「基本動機就在抗日，而最終目標則在促使臺灣回歸祖國」。

上述當時流行的理解方式，事實上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民族化」(nationalize)。筆者所謂的「民族化」，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它指的是將某一段過去所涉及的「我們」的先行者或祖先，呈現為「民族主義者」，並且認為他們許多值得我們紀念的言論與行動，都是基於這種民族主義者的身分與認同而產生的。換句話說，這是將先行者或祖先描述成自覺地認知到自己是「一個「民族」的成員、相信自己所屬的這個民族的利益與價值高於一切、同時追求民族在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第二、基於上述的第一點，民族化指的是將這一段過去視為「我們(民族)的」過去、賦予這一段過去一種民族的性格而使之成為「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這種過程與結果，是「民族化」的另一層意義，也就是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所謂的「發明傳統」(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戰後臺灣社會長久以來所面對的一大難題，是如何面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及影響。其中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之建構，與政治、文化的變遷有密切關係，而這種關係在不同時期各有變化，並且涉及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建構。關於如何理解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這個難題的一部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前，以行政長官公署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官員與外省籍人士、半山人士和臺灣人知識階層之間，曾經發生臺灣人是否受日本統治奴化的公開論爭，其中反映了臺灣人知識階層對臺灣前途的種種思考(陳翠蓮二〇〇二)。二二八事件之後，在戒嚴統治與白色恐怖下，這一類的公開討論或爭辯，已經銷聲匿跡。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與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是二二八事件後三十年左右，臺灣社會對這一段



圖一：戰後世代、回歸現實世代、與本文研究對象的關係

殖民統治歷史首度廣泛而熱烈的公開探究。

一、七〇年代之前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回顧

臺灣社會從戰後到七〇年代之間，也曾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文學發展進行公開的討論，而討論者幾乎都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親身參與過新文學發展的本省籍人士。這些從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陸續步入文學生涯的世代，大多出生於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左右。臺灣光復時，他們大約在四十歲的光景。到了七〇年代初，如果他們還健在，則都已屆六十歲上下。從戰後到七〇年代，這些親身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世代，抱著緬懷過往的心情，回顧當時的臺灣新文學發展。⁷在戰後二十幾年間，這種公開的回顧，相對於七〇年代初之後討論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熱絡而言，可以說既零星又稀少。另一方面可以想像的是，這些年長世代必須注意是否違反公共領域中國民黨政府所定位的日據時期集體記憶的參考架構或歷史敘事的基調。因此這些公開討論，經常有觸犯政治禁忌的危險。這期間這個世代的本省籍知識分子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歷史回顧，可以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八月與十二月出版的兩期《臺北文物》（三卷二期的「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與三卷三期的「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以及王詩琅（一九〇八—一九八四）、葉石濤（一九二五—二〇〇八）、吳瀛濤（一九一六—一九七一）、黃得時（一九〇九—一九九九）等人所發表的幾篇文章為代表。

從五〇年代中期《臺北文物》刊行特輯，到七〇年代初戰後新生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十七年左，以王詩琅、葉石濤、吳瀛濤、黃得時四人的文章為代表，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期，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本省籍文學作家在公開回顧當時臺灣新文學發展時，相當突出的一個共同點，是強調「抗日」的特質。亦即認為抗日不僅是日據下臺灣作家創作的最主要動機，而且他們的作品本身就是抗日行動的表現，也因此整個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抗日運動」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對這些緬懷過往的資深作家而言，這些文學上的抗日，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亦即日據時期臺灣作家在文學上的抗日，是以做為中國人的認同意識出發，而以臺灣脫離日本殖民、回歸中國的統治為目標。既然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一種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實踐，它當然是中國文學

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既然光復已達成回歸中國統治的目標，那麼以抗日為最主要創作動機的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使命已達成，自然可以功成身退。對於戰後在國民黨體制下成長的本省籍年輕世代作家融入中國文學世界，這些老一代的作家也視為當然而樂觀其成。簡言之，在七〇年代初之前，那些親身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本省籍作家，以王、葉、吳、黃等人為代表，在公開回顧當時的臺灣新文學發展，回答「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甚麼？對現在的『我們』意味著甚麼？」等問題時的參考架構，基本上與戰後臺灣社會公共領域中國民黨所建構、關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敘事模式沒有太大的不同。我們可以說，他們事實上接受了這種歷史敘事，也以此來回顧、理解他們曾親身經歷的過去。

七〇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企圖重新認識臺灣的過去，重塑關於臺灣的集體記憶，焦點幾乎都集中在日據時期，並且專注於「抗日」的議題。其中有兩群回歸現實世代成員扮演重要角色，亦即文化界人士專注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家與作品中的抗日問題，而提倡政治社會改革的異議分子（亦即黨外人士），一般則著重臺灣人抗日的政治或社會運動。

二、回歸現實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

就在上述吳瀛濤與黃得時的文章發表後四、五個月，亦即一九七二年五月，陳少廷（一九三二—二〇一一）在《大學雜誌》上發表了〈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這篇文章是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先聲。¹⁰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一年中，臺灣歷經一連串外交挫折的重大政治衝擊，包括：釣魚臺主權爭議、大專學生的保釣運動從熱烈興起到逐漸平息、國民黨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而喪失合法代表中國的地位、美國與中共簽訂「上海聯合公報」而開始關係正常化、國民黨政府因日本與中共建交而對日斷交等。這一年多以來，《大學雜誌》已由個人或社內成員聯名發表一系列呼籲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文章，成為批判政治社會、要求改革的中心。本省籍的陳少廷，當時正擔任這份刊物的社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發表前的半年期間，亦即臺灣退出聯合國以來，陳少廷認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是臺灣內政革新的首要課題，

成為公開倡議這項主張的最主要人物之一。

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中，陳少廷開宗明義，界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屬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性質。他說：

臺灣的文壇，在日據的後半期，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這個運動是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之影響而產生的。

臺灣新文學運動，在本省的啟蒙運動和抗日民族運動上，均有過重大的貢獻。臺灣新文學運動是臺灣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也是臺灣同胞抗日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同時，我們還應該了解的是，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認同祖國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所以，從大處著眼，臺灣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也是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的一個支流。（陳少廷 一九七二a：一八）

接著陳少廷指出，在日據時期「漫長的半個世紀中，臺灣同胞無時不在跟日本統治者作民族鬥爭」。不僅在前期「臺灣同胞不斷以武力抵抗日本異族的統治」，「為炎黃子孫寫下一頁悲壯而光榮的歷史」；而且在後期的非武力抗爭中，「陸續在東京、臺灣、大陸所組成的知識青年的團體」的「宗旨是一致的——解救同胞，歸回祖國」（陳少廷 一九七二a：一八一—一九）。陳少廷討論了日據後期從非武力抗日的「新文化啟蒙運動」中產生的臺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亦即隨著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三年陳端明、黃呈聰與黃朝琴分別發表〈日用文鼓吹論〉、〈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與〈漢文改革論〉，以及一九二四年張我軍開始抨擊臺灣傳統文學而來的進展。接著，陳少廷進一步綜結了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史意義」。他再一次強調：「臺灣新文學運動是直接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它始終追求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之傾向，可以說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個支流」，並且認為「臺灣新文學運動始終跟抗日的民族運動有密切的關係，文學作品也均帶有濃厚的抗日的色彩。」除此之外，陳少廷同時強調：「臺灣新文學運動，由語言改革（提倡白話文）開始，繼而抨擊舊文

學，最後才有新文學的創作。這和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過程完全相同。……後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必然要走五四的『老路子』；同時一九二七年後，「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左派思想出現，農工民眾覺醒。……臺灣文化界……有一些人走上歧途。這種情形和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完全雷同」（陳少廷 一九七二 a：二四）。最後，陳少廷語氣堅定地宣稱：

顯然，臺灣新文學運動也因臺灣光復，重歸祖國而永遠結束了。因為臺灣的文學就是中國的文學，所以再也沒有所謂「臺灣文學」可言了。（「鄉土文學」應當別論）這也就是說，獻身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先輩，已經光榮地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陳少廷 一九七二 a：二四）

陳少廷的文章結尾，曾註明他主要參考的是本文前述的《臺北文物》那兩篇特輯，以及王詩琅、黃得時等人的著作文獻。然而做為戰後受國民黨體制教育而成長的年輕世代一分子，陳少廷要比王、葉、吳、黃等在日據下成長的本省籍資深作家，更強調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興起、發展與性質的影響，並且更加突顯當時的臺灣新文學做為五四後中國（新）文學一部分的歷史定位。陳少廷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連繫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他展現了比那些本省籍資深作家更強烈的中國國族認同，也比他們更明顯地運用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主題、關於十九世紀中葉後「中國人」、「中華民族」與外國強權對抗的國族歷史敘事模式，藉此去理解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歷史意義」（見上述表一）。

七〇年代初，一連串外交挫折，加上海外臺灣獨立運動的明顯發展，都威脅到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此時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改革，批評主要由老一代外省人組成的中央民意機構不足以代表臺灣社會的民意等，都牽涉到戰後本、外省人政治權利不平等的敏感問題，同時也涉及二二八事件後本、外省人經常互不信任的複雜關係。對陳少廷而言，回顧日據下臺灣新文學，強調其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性質，主要的目的即在希望這一段文學的過去，能被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模式中，成為其情節的一部分，亦即成為「我們」「中國人」集

體記憶的一部分，而藉此更確認臺灣人（包括做為戰後世代一分子的陳少廷自己）的「中國性」（Chineseness）。如此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中國）民族化」，即在於證明「本省同胞是最愛國的、最優秀的中華兒女」，¹¹因此應獲得做為祖國政府的國民黨政府之充分信任，應享有與外省人平等的公民身分與政治權利。

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發表之後，許多回歸現實的年輕知識分子和他一樣，也重新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而他們依賴的意義參考架構，大致上不出陳少廷一九七二年初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的範圍。陳少廷的這篇文章，事實上預示了接下來十年左右，回歸現實世代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而建構抗日集體記憶的基本方向。

伴隨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而來的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探索，夾雜在批判「現代主義文學」、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小說出現等趨勢中，因而成為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主要表現之一。陳少廷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發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前後，臺灣的文學界也正開始出現對六〇年代以來占優勢而深具影響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尤其是現代詩）的激烈批評。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間的「現代詩論戰」中，批評者指責現代文學主流的現代詩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及個人主義的殖民，因而意識混亂、晦澀怪誕、捨棄傳統、以及逃避現實（趙知悌 一九七六：一；高上秦 一九七六（一九七三）：一六四、一六八—一六九）。

一九七三年八月，屬於外省籍戰後世代的尉天聰（一九三五—）等人籌辦《文季》，由本省籍而隨後成為重要鄉土小說家的王拓（一九四四—二〇一六）主編（葉石濤 一九八七：一五六）。前後僅發行三期的《文季》，具體呈現了回歸鄉土文化潮流在文學領域的三方面主要發展，亦即批判現代主義文學、社會批判意識強烈的鄉土小說出現，以及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同時包括光復以來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與作品）。《文季》第一期的〈發刊詞：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清楚顯示尉天聰等人經歷七〇年代初的臺灣社會政治劇變後，終於將之前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反省與不滿呈現為清楚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主張。同時在這份創刊號上，除了登載唐文標（一九三六—一九八五）抨擊臺灣（包括香港）現代詩的重要文章之外（唐文標 一九七三），也刊出了尉天聰、王紘久（王拓）與何欣（一九二二—一九九八）三人的評論，批判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歐陽子的小說。這是對現

代詩的抨擊擴展到小說的開端（尉天驄 一九七三：六一—七五，王紘久 一九七三：七六—八二，何欣 一九七三：四六一—六〇）。另外，《文季》創刊號也刊登了當時另一位戰後世代重要的鄉土小說家黃春明（一九三五—）的短篇小說〈莎喲娜拉·再見〉，具體呈現他在寫作風格上的明顯轉變，亦即從六〇年代後期充滿溫情地描寫鄉間小鎮卑微、苦難的小人物，轉變到七〇年代初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意識地剖析城市生活與人物（黃春明 一九七三：九七—一三一）。同年十一月，第二期的《文季》刊出「現代中國作家的考察」專輯，一併出現張良澤（一九三九—）、史君美（唐文標）、劉若君所撰的三篇文章，討論成長於日據時期、光復後去世的本省籍小說家鍾理和及其短篇小說，並重刊他在一九五九年發表的一篇舊作（張良澤 一九七三：四八一—五九；史君美 一九七三：六〇—七六，劉若君 一九七三：七七—八一；鍾理和 一九七三（一九五九）：八二—九〇）。另外，這一期也登出比鍾理和年長十歲而仍健在的另一位日據時期本省籍小說家楊達的舊作（楊達 一九七三（一九五九）：一〇五—一四二）。楊達與鍾理和隨後成為整個七〇年代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討論中最受重視的兩位作家，而《文季》對兩人的討論或重刊其舊作，稱得上是開路先鋒。

一九七四年八月，第三期的《文季》又登載了本省籍的林載爵（一九五一—）的〈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和陳少廷一年前發表的那篇短文相比，林載爵的這篇文章，是回歸現實世代在七〇年代初臺灣的時局變化中，最早較完整地探索這一段文學往事的嘗試（林載爵 一九七四：一三三—一六五）。於是從《文季》第二期發刊的一九七三年底之後，對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包括從日據到光復後仍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與作品，開始逐漸進入熱烈探索的階段。從此到七〇年代末，對於一些已去世或仍健在的資深本省籍作家的介紹、評論、紀念專輯、舊作重刊等，或者是概括地談論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文章、專輯、座談會紀錄等，就不斷地出現在報紙的副刊與文藝性或綜合性的刊物上。同時其中一些作家個別作品的專輯或全集，也都陸續整理出版。另外，一些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主要的期刊雜誌，以及相關的報紙，也被複印出版。到了七〇年代即將結束的一九七九年，更出現了兩種卷帙宏富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品的選編套書，涵蓋了小說、詩歌、散文，以及當時相關的論說

如同上述，七〇年代隨著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之後而來的年輕知識分子對於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公開探索，其意義的參考架構大致不出陳少廷的那篇文章的範圍，亦即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模式，一個建構中國人、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意義參考架構。這個敘事模式或參考架構，特別強調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認同祖國的抗日性質，以及它無可置疑地做為中國文學一部分的「事實」。一九七三年底之後，對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逐漸熱烈的探索，是一個以回歸現實世代為主，逐漸將這一段殖民時期的文學過去（中國）民族化」的過程。雖然將這段過去（中國）民族化，並不是從七〇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才開始，但是七〇年代這個過程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是戰後國民黨教育體制下成長的年輕世代的生命歷程與這個時期特殊歷史發展交會的結果。個人生命歷程與社會歷史過程的交會，促成這一段殖民時期文學過去的再發現與再度「（中國）民族化」。許多回歸現實世代成員既辨識、確認這一段過去的中國性，也再辨識、再確認他們自己的中國性。

七〇年代文學界的回歸現實世代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集體記憶建構，是他們從更寬廣的歷史角度重新理解現實、普遍覺醒下的發展。當時臺灣的特殊歷史情境，既激起他們對臺灣鄉土的關切，也激發他們強烈的國族情感。這一波的集體記憶建構，是這些文學作家、批評家與文學史研究者基於這種情感，在中國國族歷史敘事模式中關懷臺灣社會現實的實踐。這種新的、非國民黨官方的集體記憶建構，是他們建構集體認同的一個重要面向，亦即他們企望解決臺灣困境、追求臺灣社會發展時，確認自己所屬世代的歷史位置與意義的過程及結果。

鄉土文學作家的國族認同與社會關懷

筆者在上述指出，一九七二年夏《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發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成為回歸現實世代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先鋒。在這篇文章發表的過去一年中，臺灣經歷釣魚臺主權爭議事件與保釣運動、喪失聯合國席位、美國與中共簽訂上海聯合公報、對日斷交等重大事件衝擊，而當時《大學雜誌》也成為批判政治社會、要求改革的重心。陳少廷發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正顯示保釣運動之後年輕知識分子所開始發展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調的社會關懷與鄉土意識，也逐漸出現在文學領域。上述的討論也提到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

三年間的「現代詩論戰」，其中參與者對於臺灣現代詩的批判，包括指摘語言形式上的語義晦澀、過分使用西方意象與句法，內容思想上則耽溺於個人情感、逃避當代社會現實，並且批評新詩作者是傳播「帝國主義文化」的「文化買辦」等。這些批判，逐漸凝聚為對於文學必須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的要求。當時提出這種要求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不只針對詩歌，而且也針對小說與整個文學領域。

前面的討論也指出，一九七三年八月外省籍的尉天驄創刊的《文季》，具體呈現了回歸鄉土文化潮流在文學領域的三個主要發展，亦即批判現代主義文學、社會批判意識強烈的鄉土小說出現，以及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探索。其中不管是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或是對日據時期以來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與作品的興趣與討論，既出於對土地與人民（亦即對鄉土）的關懷意識，也呈現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文季》以及之前相關的文學雜誌，¹³培養了陳映真（一九三七—二〇一六）、黃春明與王禎和（一九四〇—一九九〇）等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主要作家，而他們都屬於本省籍。在《文季》創刊號上，既出現本省籍的王拓與其他對現代主義小說的批判，也刊登了黃春明寫作風格明顯轉變、充滿社會批判意識的短篇小說〈莎啞娜拉·再見〉。雖然《文季》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停刊，但當時的文學氣氛已明顯改變，「鄉土」與「現實」成為文學討論中流行的字眼。在「鄉土文學論戰」於一九七七年發生之前的幾年，支持鄉土文學的大量文章出現在各種雜誌與報紙上。在這期間，本省籍的王拓與楊青矗（一九四〇—），也成為另外兩位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呂正惠 一九九五—一九九二：五七）。王拓則與尉天驄、陳映真，又成為闡釋鄉土文學理論的主要人物。鄉土文學的作品主要是小說，而鄉土文學作家最大的共同特色是他們的「寫實精神」。根據劉紹銘的歸納，鄉土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包括：（一）批判日本與美國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在文化與經濟方面；（二）要求社會福利改革與財富的公平分配；（三）謳歌小鎮與鄉村「小人物」的基本美德；（四）中國人面對「醜陋的美國人」與「貪婪好色的日本人」無恥粗俗的行為時，應維持民族自尊（Lau 1983: 147）。

一、鄉土文學作家的省籍、世代、與國族認同

如同筆者在前面指出的，回歸現實世代在年齡範圍上屬於戰後世代，亦即他們在七〇年代時大約二十到四十幾歲之間。他們不管是本省或外省籍，即使不在臺灣出生，也幾乎都在戰後的臺灣成長，並接受國民黨體制下教育。這個戰後世代的共同特色，同樣反映在七〇年代的文學領域。當時一位文學研究者在討論和鄉土小說家年紀相近的一般年輕作家時就認為，即使他們有省籍之別，但「同樣沒見過大陸是甚麼樣子，同樣在臺灣接受同樣的教育」（侯健 一九七八：一六九—一七〇）。楊青矗在一九七四年底曾接受訪問，訪問者提到「像您這一代三、四十歲的臺灣人，處在變遷很大的社會中，就您是個作家而言，您覺得受到中國、西方、日本何者影響最大？」楊青矗的回答，值得詳細徵引。他說：

我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出生，臺灣光復時我才五歲，童幼無知，沒有見過日本人的真面目，對日本人的行為都是聽來的。我寫過幾篇日據時代的小說，也是聽老一輩的人閒談從中取材寫成的。鄭清文、李喬等人大我六、七歲，讀過日本書，看懂日文的文學作品，我想他們多少能從中直接吸取日本人的東西。在四十四、五歲左右受日本教育的人，我接觸的不少，這些人日本思想相當濃厚，他們瞭解日本人，也瞭解中國人；時代的嬗變使他們感性敏銳，凡事都會拿中國人的作法和日本人的作法對比，對是非的判斷往往依據他們那一套日本精神的想法。他們厭惡日本人欺壓我們同胞的行為，但也佩服日本人的好處，他們精通日文，卻無法用中文寫簽呈或公文，更無法以中文來寫出他們對事情的看法；對他們很納悶，社會上貪污，或其他他們看不順眼的事情，他們會以他們的日本精神藉聊天來發洩他們的看法。這些，我聽得太多了，我未成年時對這些人覺得他們「強國奴」的劣根性難改，慢慢年歲漸長，自己能夠獨立思考和判斷，我能瞭解他們，他們嘴說的是日本精神，身作的是保住飯碗的可憐相，我藉他們這面對比的鏡子透視了我身為中國人的真面目。至於日本文學中譯的作品，大多是軟性的東西，我不重視這些東西，所受影響甚少。

我沒有出國喝過洋墨水，讀的是中國書，三者之中當然以中國的影響較大。但以文學作品來講，我無法讀到三十年代的中國作品，翻譯的世界名著倒看不少，小說的寫作技巧和某些觀念受西方不少影響。

影響我最大的不是書本，而是臺灣的民情，我從民間吸收養分，我的作品是民間的生活、思想和他們對人間煙火的欲求加上我自己的「本性」寫成的。¹⁴

楊青矗的自白，很典型地代表與他年齡相近的本省籍戰後世代在國民黨統治下所受的文化薰陶與國族認同教育的深刻影響。在比較中國、日本、西方對他創作的影響時，楊青矗認為中國的影響較大，這固然是實情，但是這種「中國」影響，是經過國民黨過濾管制的。他所謂「無法讀到三十年代的中國作品」，是國民黨肅清異議與控制出版而禁絕中國一九三〇年代左傾文學作品的結果。陳映真在當時也曾概括指出：「這一代在臺灣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不分省籍，都與『五四』的傳統斷絕了」（陳映真 一九七八：一七五）。在國民黨的制式歷史教育與言論控制下成長，他們與一般的戰後世代成員一樣，只能依賴國民黨的固定說法來理解中國或臺灣過去的歷史。一九七一年夏《大學雜誌》曾發表〈臺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形容本省籍上一代知識階層被批評為接受「奴化教育」時的無可奈何、熟悉日文卻無法藉著它發言、以及終日生活在回憶之中而成了被社會遺忘的一群（包青天等 一九七一：三四—三五）。這些觀察，都與楊青矗對那些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的父兄輩之觀感，不謀而合。楊青矗所屬的戰後世代，接受了國民黨以學校教育灌輸的中國民族主義，使他們在國族認同上中國化。因此他與眾多的本省籍戰後世代一樣，和那些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的父兄輩有所隔閡，乃至於譏諷他們無異為強國之奴。¹⁵關於他自承沒有出國，卻看了不少西方翻譯小說而使寫作技巧與觀念受到影響，也是相當有代表性的成長經驗，反映六〇年代西方文化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

至於楊青矗所說影響他最大的是「臺灣的民情」，則是使他（事實上也包括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王拓）異於外省籍戰後世代而成為鄉土小說家的核心因素，亦即他們的省籍身分。當時較年長、屬於外省籍的重要文學批評家何欣在討論鄉土文學發展的原因時，談到「一些生長在臺灣農村青年作家」開始「了解此時此地的現實」，

而在作品中表達出來。何欣指出：

……這些作家所受的教育使他們能運用普通國語恰當地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他們對於臺灣農村和農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有深厚的感情，如果他們接觸多的是工人，就對工人有厚愛，他們深切了解這些人的一切——他們的辛酸，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歡樂。在感情上仍以臺灣為客居之地的作家們對這些是不能徹底了解的。
(何欣 一九七九(一九七七)：三七—三八)

鄉土文學的主要作家，雖然都具有清晰的中國國族認同，但是他們深入描寫臺灣社會現實的作品，對於揚棄他們那一代本省籍年輕知識階層的流亡漂泊心態，已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在當時政治上回歸現實、文化上回歸鄉土的普遍潮流中，這不僅是對本省籍讀者而言如此，對於外省籍讀者亦然。何欣同時指出，「年輕的讀者，不管戶籍謄本上的籍貫為何處，他們生長在這裡，他們自然關懷這裡；對他們自己的故鄉，無論有萬里長城也好，有桂林山水也好，只是聽說或從教科書上讀到的，他們不會再有上一代的『濃濃鄉愁』。這些都促成了寫此時此地的文學作品的受到重視與歡迎。」(何欣 一九七九(一九七七)：三七—三八)

二、鄉土文學作家的覺醒與社會關懷

鄉土文學的主要作家與支持者，是七〇年代初覺醒的回歸現實世代中重要的分子。六〇年代年輕知識分子經常流露無根失落與孤懸於歷史之外的感受，並且深受西化思潮的影響，以西方為理想的社會文化標準。七〇年代初年輕知識分子由於臺灣外交的挫敗而覺醒，首先就是反省與批判他們自己在六〇年代成長歷程中對西方文化的景仰、個人主義的生活態度等。他們同時也指出，由於保釣、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等局勢的變化，才使他們確定轉向「關心國土上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一步步發展到鄉土文學的道路」，注重文學的民族性與社會關懷(尉天聰 一九七八：一六三、一六五；陳映真 一九七八：一七四—一七六)。

和陳映真一樣是本省籍而較晚崛起的鄉土小說家王拓，在釣魚臺事件前幾個月，才發表他最早的短篇小說。從釣魚臺事件到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美國與中共發表上海公報、日本與中共建交這段期間前後，王拓還是一位研究所學生。在臺灣退出聯合國時，王拓與一群尚在就學或甫離校門的戰後世代成員，包括臺大保釣運動以來的學生領導人物王杏慶、王復蘇、洪三雄、錢永祥、王曉波等，共同在《大學雜誌》上發表〈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宣言，呼籲同胞與他們「將每一分力量都用到保衛臺灣統一中國的努力上」（王杏慶等 一九七二：二三）。一九七五年夏，王拓將他批判政治社會問題的文章，投稿刊登在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一九三八—）等人創辦的《臺灣政論》創刊號上，開始與黃信介等黨外人士結識。王拓指出，「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都是在這個（保釣）運動中被教育過來的人，而今天社會上普遍高漲的民族意識，也正是當年的這個保釣運動所激發起來的」（王拓 一九七八〔一九七七〕：一〇二）。

另一位主要的鄉土小說家黃春明，在一九七八年初的一次演講中，曾經回顧他的寫作歷程的變化，亦即如何從六〇年代後期相當溫情地描繪鄉村小鎮卑下苦難的小人物，轉變到七〇年初充滿社會批判意識而剖析城市生活與人物，尤其是臺灣對美國與日本的政治或經濟依賴下城市小人物的生活困境。黃春明坦承，他這種寫作歷程的改變，是因為他進入七〇年代後才「看清自己的過去，認識了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係」，使他的「心靈才有一路成長，也開始會多做思想」，於是小說轉而充滿強烈的「社會性」（黃春明 一九七八：六一）。黃春明接著說：

把我們的民族，把我們的社會，比喻做一棵神木的軀幹的話，做為一片樹葉子的我們，在枝頭上的時光，我們只有努力經營光合作用，當我飄落地的時辰，我們即是肥料。我們個人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神木的軀幹，即是每一片葉子的努力和盡職。五千年的神木，就意味着有五千梯次的發芽與落葉。我的寫作經驗是徹底的失敗了，我仍然希望成為一個作者，做為神木的一片葉子，和大家一起來為我們的社會，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獻身。（黃春明 一九七八：六二）

上述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黃春明等人回顧自己與其他年輕知識分子的重大轉變，顯示臺灣的外交挫敗等重大創傷事件刺激他們從更大歷史與社會脈絡來理解現狀、關懷鄉土時，使他們的世代認同與國族認同緊密結合，成為批判意識與行動的重要動力。他們積極地在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中定位自己，亦即在國族歷史敘事鋪陳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架構中，尋找自身存在意義而形塑他們的世代認同，將他們的個人生命與國族命運真切地聯繫起來。

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與政治反對運動

七〇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他們既對自己的世代身分有強烈的自覺，也強烈關懷臺灣的歷史，尤其是本省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黨外人士這兩方面的歷史感，都來自他們的本省籍背景，但也都鑲嵌在更大的、基於中國（民族）認同的歷史敘事而展現出來。

一、臺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回顧的開端：康寧祥、《臺灣政論》與政治改良主義

上述黨外人士兩方面的特殊歷史感，首先在康寧祥身上展現出來。一九七二年六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國民黨的最高權力開始由蔣中正轉移到蔣經國。同年底，康寧祥在臺北市當選為立法委員。一九七五年二月，蔣經國在施政報告中，強調戰後三十年間，雖然很多事物都在改變，但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基本國策絕不改變。¹⁶三月間，康寧祥針對蔣經國的施政報告提出質詢。他首先談到臺灣面臨的國際局勢變化，尤其是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美國可能即將與中共建交等，已使中華民國的國際承認減少，「法統」備受威脅。其次，康寧祥談到國內環境變化，批判當時僅占臺灣百分之三·二人口的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壟斷了政治領導階層。他要求國民黨當局必須重視年輕的世代。康寧祥指出，這些年輕世代高居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他們是戰後「二十幾年來，在全世界智識爆發和科技突飛猛進的環境下長大成人」的「四十九歲以下的世代」。¹⁷他進一步提出四大政治變革的主張，首先要求（一）調整國家預算以因應臺灣社會更實際的需要；（二）制訂「政黨法」以促成在

野黨成立；(三)地方政制的法治化。除了這三項主張，他強調國民黨當局應該「重新確認臺灣『歷史文化』的價值和地位」。他特別敘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受到西方近代社會政治思潮影響的臺灣人抗日運動，包括「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康寧祥強調「在日本人統治的五十年間，臺灣人受日人欺辱、壓迫、殺害而受的痛苦和犧牲，並不下於大陸同胞八年抗戰之苦」。他同時強調，臺灣人的抗日，是由於他們懷有堅強的民族意識與「思慕祖國」的心志。他認為，臺灣人的抗日運動，是「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的珍貴財富」。¹⁸

做為七〇年代黨外運動先驅與領導者之一，康寧祥這次質詢的意義重大，既代表黨外對自己的戰後世代身分的自覺，也是發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開端。回顧七〇年代，康寧祥在黨外這方面的象徵性地位，非常類似當時《大學雜誌》的社長陳少廷在戰後世代的文化界人士中的地位。陳少廷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發表於《大學雜誌》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開啟了文化界的戰後世代重新探索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風潮。綜括來看，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挖掘與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本省人的政治與文學活動的歷史，康寧祥、陳少廷兩人扮演開風氣之先的角色。

陳少廷在闡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歷史意義時，將這些新文學的發展視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情節的一幕(episode)(或幾幕)。同樣地，康寧祥也將臺灣的過去(特別是臺灣人抗日史)視為這種歷史敘事情節的一幕(或幾幕)。這種「情節賦予」或情節化(employment)的方式，意味著臺灣人抗日史的意義必須從這個敘事整體來理解。這種歷史敘事的建構，一方面強調臺灣歷史經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則指出臺灣歷史經驗的中國性，希望這種與外省人不同的歷史經驗在公共領域獲得承認。陳少廷、康寧祥的這種集體記憶的重新建構，是改良主義(reformism)的。這和當時回歸現實世代的社會政治變革主張一樣，都是在中華民國體制內所進行的革新要求。

七〇年代臺灣的政治反對運動相對上比較溫和，黨外人士期許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忠誠的反對者」。他們主要的訴求，是「民主化」。就省籍問題而言，從七〇年代初《大學雜誌》、黨外運動以來，涉及省籍的社會政治

革新主張，是在體制內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獲得平等的公民權與政治權。康寧祥在質詢中強調臺灣民眾思慕祖國、認為臺灣人抗日史是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的珍貴財富等，呈現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模式，以及體制內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因此減低了對國民黨意識型態的挑戰，甚至反而有助於國民黨關於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型態宣傳。

一九七五年八月，黃信介、康寧祥與張俊宏等人創辦的《臺灣政論》，是七〇年代第一份黨外雜誌。《臺灣政論》在同年底被國民黨政府查禁，只發行五期，其中四期分別都出現一篇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的文章（見表二）。這四篇文章所討論的，都是一九二〇年代開始受西方近代政治社會思潮與中國局勢等影響，而以蔡惠如、林獻堂等人為先驅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人物。這些文章的內容，都符合《臺灣政論》在政治社會議題上溫和的改良主義。

表二：《臺灣政論》涉及臺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序號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備註
1	葉榮鐘	1975.8	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	1	56-58	在「人物介紹」專欄下刊行
2	凡夫	1975.10	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	3	66-69	在「人物介紹」專欄下刊行
3	正宏（譯）	1975.11	日本人眼中的臺灣抗日運動	4	48-52	譯自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
4	凡夫	1975.12	革命家蔣渭水	5	76-79	在「人物介紹」專欄下刊行

二、黨外新生代、政治反對運動與臺灣史

七〇年代初臺灣的外交挫敗，使年輕知識分子覺醒，成為回歸現實的世代。以《大學雜誌》人士為主對政治社會改革的要求，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之間受到國民黨壓制。然而回歸現實世代並沒有消失，反而更實際直

接地參與社會政治改革。其中主要途徑之一，就是投入年輕一代本省籍的民意代表黃信介與康寧祥所領導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尤其是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間，許多回歸現實世代的知識分子陸續投入黨外運動。他們努力探索與宣揚臺灣史（特別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以尋求他們反國民黨行動的歷史定位。這逐漸成為普遍現象，匯聚成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一部分。

七〇年代初之後，具有政治社會改革意識的年輕知識分子，對於自己做為戰後世代的身分相當地自覺，因此普遍以「新生代」一詞指稱自己所屬的世代。黨外人士經常強調自己的世代與年長世代的不同，並且認為他們自己應該在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們雖然對國民黨的統治與教育體制不滿，但也慶幸自己能在戰後臺灣二十幾年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與成長，因此與父、祖輩不一樣。他們讚頌新生代有開闊的胸襟、遠大的理想、強烈的正義感，能明辨是非，崇尚真理而無懼權威等。譬如當時本省籍、三十幾歲的黃煌雄（一九四四—）加入黨外後，曾經如此說：

我習慣性的喜歡將近代史上的臺灣同胞分為三輩：我的祖父輩、父親輩，和我們這一輩。上兩輩都經過日本人的統治以及國民黨的統治。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現象是，老祖父輩三十年來已經成為被遺忘的一代，他們活在暗淡的歲月裡，不想再重提往事；他們已經是垂暮之年，不再有任何期待。父親輩在光復後目睹了一場大變局〔筆者按：二二八事件〕，絕大多數，特別是聰明人，開始遠離政治，閉口不談政治，這是他們基於時代性的教訓所造成的。他們這兩輩幾十年來生活事實的本身，就是很好的表白。（黃煌雄 一九七八a：一六一—一七）

到一九七九年秋天《美麗島》雜誌創刊前後，絕大部分的本省籍黨外人士，都認為自己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因此他們在理解新生代在變局中的角色，提出政治改革主張時，大致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尤其是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敘事。這種歷史敘事與國族認同，與他們在體制內要求民主的改良主義是相互呼應的。因此他們討論臺灣的各種社會、政治問

題時，都從中國歷史談起。在當時臺灣遭受外交挫敗、面臨生存危機時，黨外人士也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充滿懇切的期待（例如張俊宏 一九七七：一五七—一五八，二二九—二三〇、二四五—二四六；黃煌雄 一九七八 a：一六；林濁水 一九七九：二〇—二四）。這些都顯示在形塑戰後世代的中國國族認同上，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的成功。

除了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之外，黨外人士另一方面鮮明的歷史感，是對臺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這種歷史感，與他們的世代認同一樣，都鑲嵌在特定的歷史敘事中，顯示他們從過去來定位現在與未來，而他們對現在與未來的期望，又影響他們對過去的歷史建構。他們的歷史建構，又與他們的政治反對行動密不可分。

雖然戰後世代的知識分子深受中國國族認同的教化，但是他們不論本、外省籍，都在臺灣成長，因此對於中國國族歷史與命運都有某種隔閡感。不過他們對於從小所生活的臺灣社會的歷史，也很少瞭解。當時文化界的回歸現實世代在重新發現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新文學時，經常批判自己對這些歷史的無知，並且感嘆與上一代歷史經驗的隔絕。黨外人士也類似，經常感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在戰後被遺忘。

日本殖民統治是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近代國家統治模式，與戰後世代所經歷的國民黨統治，有類似之處。對於反國民黨的黨外人士而言，兩者都是少數統治者以不平等方式凌駕多數人。黨外人士在正當化其政治反對行動時，殖民統治下的反抗運動成為切近而可以援引的歷史經驗。黨外的重要人物張俊宏曾指出，康寧祥在七〇年代初將臺灣歷史（尤其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帶入競選演講，「使黨外群眾運動加入了承繼歷史使命的高貴感」。他同時指出，「以前的智識分子總以為選舉就是流氓或草莽英雄的運動，不屑一顧，康寧祥扭轉了智識分子的觀念，使他們熱誠地開始投身於黨外群眾運動之中」（張俊宏 一九七七：一九二—一九三）。

黨外人士對臺灣歷史的強烈關懷集中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特別是臺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

這反映在七〇年代最主要的四份黨外雜誌上：《臺灣政論》（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月）、《這一代雜誌》（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十年代》（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月）、《美麗島》（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月）。前面已提到，最早的《臺灣政論》觸及臺灣歷史的四篇文章，主題都在於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人物。除此之外，《這一代雜誌》、《八十年代》與《美麗島》涉及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各階段臺灣史的文章，各有三、五、三篇（見表三、四、五）。這三份雜誌專注於臺灣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的文章，卻各有八、六、四篇（見表六、七、八）。這些涉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的十八篇文章，除了少數三、四篇之外，都在探索二〇年代臺灣人對殖民統治的反抗。

表三：《這一代雜誌》涉及臺灣史（日據時期除外）的文章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備註
何文振	1977.10.7	臺灣的歷史出路	4	11-16	
戴市政	1977.10.7	記臺灣光復的歷史鏡頭	4	40-42	在「學術史話」專欄下
鍾孝上	1978.11.15	讀臺灣歷史有感	15	45-46	

表四：《八十年代》涉及臺灣史（日據時期除外）的文章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林濁水	1979.9	臺灣是美麗島	1.4	20-24
王詩琅	1979.9	臺灣拓殖的過程	1.4	84-87
李欽賢	1979.10	淺探三百年來臺灣美術的時代意義	1.5	82-87

張旭成著	1979.12	美麗之島	2.1	7-10
胡倚風譯				
楊祖珺	1979.12	苦旦歌仔的滄桑	2.1	91-94

表五：《美麗島》涉及臺灣史（日據時期除外）的文章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備註
魏廷朝	1979.9	新竹義民廟的祭典——客家人最大的拜拜	1,2	77-78	在「美麗島」專欄下
劉峰松	1979.10	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	1,3	69-76	在「美麗島」專欄下
謝蒼心	1979.11	革命家呢？還是流寇？（上）——「林爽文起義」的一些觀察	1,4	99-104	在「美麗島」專欄下

表六：《這一代雜誌》涉及臺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備註
	1977.8.1	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	2	54-63, 46	在「學術史話」專欄下。
		世46週年座談會			時間：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

主辦者：這一代雜誌社
 參與者：陳黎陽、黃煌雄、楊雲萍、王詩琅、蔣松輝、田朝明、陳益勝、康寧祥、姚嘉文、黃天福、張俊宏、陳少廷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備註
	1977.9.10	臺灣近代「先覺者」的精神 遺產座談會	3	17-24	在「臺灣史討論會」專欄下。 時間：一九七七年八月 參與者：張俊宏、黃煌雄、洪炎秋、王詩 琅、陳益勝、康寧祥、陳少廷、陳偉士、 王聖士、胡月涵
蔣渭水	1977.10.7	今年要做什麼？	4	36-37	在「學術史話」專欄下。遺作重刊
黃煌雄	1977.11.5	臺灣近代「先覺者」的民族 情採	5	27-29	
	1977.12.15	臺灣青年的使命	6	52-53	轉載自《臺灣民報》
黃煌雄	1977.12.15	贊助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日 本人士的評價	6	57-63	文末自註：本文曾發表於《自立晚報》， 略有修改
林熹雄	1978.8.15	黃師樵先生談「革命先賢」 蔣渭水	12	12-13	
黃煌雄	1978.8.15	一項莊嚴的建議——紀念蔣 渭水先生逝世四十七週年	12	19-21	
黃煌雄	1978.12.15	從蔣渭水精神談起——兼論 臺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16	44-45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蔣渭水紀念 歌發表會」上專題演講詞
表七：《八十年代》涉及臺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李南衡	1979.7	日據時代臺灣的言論自由	1.2	15-18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卓國豪	1979	不准紀念蔣渭水？	1.4	73-74
本刊編輯	1979	蔣渭水活在我們心中	1.4	79-80
黃煌雄	1979	蔣渭水先生遺訓	1.4	80-82
李筱峰	1979	日本殖民下臺灣的宗教自由——看五十年前金權階級謀奪教產、教權的兩個個案	1.4	83-84

本刊編輯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1979.11	偉大的醫者——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特別報導——昔日臺灣社會中傑出的醫師	1.6	77-83

1. 吳海水醫師——臺灣真青年，文化運動先覺者
2. 賴和醫師——悲天憫人懷抱蒼生的臺灣文學之父
3. 韓石泉醫生——大丈夫不為良相當為良醫
4. 謝緯醫師——醫人肉體救人靈魂的臺灣史懷哲
5. 吳新榮醫師——愛同胞、愛鄉土愛民族的詩人作家
6. 陳新彬醫師——威武不屈，視死如歸的人格者

表八：《美麗島》涉及臺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作者	出版年月	篇名	卷期	頁數	備註
黃煌雄	1979.8	大家來紀念蔣渭水先生	1.1	93	在「美麗島」專欄下
王詩琅	1979.8	日人在臺殖民地體制之奠定——為紀念舅父廖金泰先生而作	1.1	94-95	在「美麗島」專欄下
文抄公	1979.10	臺灣人有衛生，不識字！——與林洋港先生談臺灣教育史上最起碼的常識	1.3	87-92	在「美麗島」專欄下
文抄公	1979.11	請正確認識歷史的事實——向蘇南成市長進言	1.4	91-98	在「美麗島」專欄下

三、黃煌雄的日據時期與蔣渭水研究

從《這一代雜誌》、《八十年代》與《美麗島》中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歷史的文章（見表六、七、八）可以看出，在黨外人士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抗日的政治社會運動史探索中，黃煌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當時三十歲出頭的黃煌雄，在一九七八年底首次成為黨外立法委員候選人之前，已發表不少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的文章，而被稱為「研究臺灣史的專家」（林正杰 一九七八：五三）。他的著作重點在二〇年代臺灣人的抗日，並且出版了三本書。其中《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是蔣渭水的評傳（黃煌雄 一九七六），《臺胞抗日史話》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抗日的政治社會運動（黃煌雄 一九七七），《被壓迫者的怒吼——蔣渭水先生選集》則重新刊行蔣渭水的言論與文章（黃煌雄 一九七八b）。黃煌雄對臺灣歷史的探索，加入黨外的過程、以及他將二〇年代臺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七〇年代黨外反國民黨運動聯繫起來等，既顯示回歸現實世代知識分子的強烈歷史感，也顯示他們依賴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來理解臺灣鄉土的過去，定位自己與臺灣當前所處的時代與情境，並且建構某種關於自我、世代與行動的意義。

一九七〇年獲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後幾年，黃煌雄曾任職企業界與教書，但是他後來辭職，專心寫作。就在他探索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並且寫作、出版的過程中，黃煌雄逐漸與黨外建立關係。¹⁹ 加入黨外之後的黃煌雄，就像當時其他黨外人士一樣，具有鮮明的歷史感，既對戰後世代身分有強烈自覺，也相當關懷臺灣歷史。他致力於將臺灣人的抗日活動與戰後世代的反國民黨政治運動聯繫起來，為自己所屬的世代與黨外運動在臺灣歷史上，同時也在中國歷史上，尋找適當的定位與意義。黃煌雄是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間投入黨外的回歸現實世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

在《臺胞抗日史話》一書的最後，黃煌雄歸納二〇年代（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之前）反抗殖民統治的「先覺者」的「精神遺產」時，認為這些先覺者「激發臺灣同胞的漢民族意識」，「並使臺灣同胞以中華民族為榮」，「對中華民族具有濃厚的認同感」，也相當尊崇代表中國近代革命主流的孫中山。黃煌雄強調

「『先覺者』以及在『先覺者』影響下的臺灣同胞，不僅『絕對沒有對不起祖國』，更絕對沒有對不起中華民族；而這是了解臺灣同胞應有的心理基礎與心理認識。」（黃煌雄 一九七七：一八四—二〇二）。黃煌雄一方面指出臺灣人受殖民統治的特殊經驗，另一方面強調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認同中國、中華民族、沒有對不起祖國與民族，這就像康寧祥在一九七五年初對蔣經國的質詢一樣，都是要求臺灣歷史經驗的特殊性與中國性在公共領域獲得承認與重視。同時，這也在於反駁戰後以來國民黨政府與許多外省人對於本省人被日本人「奴化」的指控，要求在政治上與文化上平等對待本省人。

黃煌雄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後期抗日的臺灣人認同中國、中華民族，因此他的研究重點就集中在被日本殖民當局視為「極端民族自決主義者」的蔣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二）身上。²⁰黃煌雄在一九七六年出版《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並自認為這「可能是目前臺灣及世界上第一本以蔣渭水先生為主題而寫的書」（黃煌雄 一九七八c：二五）。在這本書最後，黃煌雄談到蔣渭水反抗殖民統治十年的活動的歷史意義時，強調蔣渭水不僅有強烈的「鄉土情感」，也是「中華民族一位偉大的抗日英雄」（黃煌雄 一九七八c：二一八—二二八）。黃煌雄進一步強調孫中山對蔣渭水的政治主張的重大影響，認為蔣渭水是「『臺灣的孫中山』先生」（黃煌雄 一九七八c：二六一—二八二）。對黃煌雄而言，戰後臺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反抗活動的延續，同樣都是認同中國、中華民族的（黃煌雄 一九七八d：二〇）。

在一九七七年當選為省議員的張俊宏，曾經推崇黃煌雄對臺灣社會最大的貢獻，是「潛心於發掘和整理祖先的遺產」，並肯定其價值，使遭受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高壓支配、與省籍之間不平等而自卑抑鬱的臺灣同胞「重新找回了尊嚴和寄託」。張俊宏強調，黃煌雄「不斷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現實政治，使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更具有其縱深」（張俊宏 一九七八：五一—五二）。如同前述，黃煌雄是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間投入黨外的回歸現實世代知識分子的典型。這個世代的特色是：對自己所屬世代身分有清楚的自覺、充滿強烈的歷史感、認同臺灣鄉土而熱切關懷臺灣歷史。他們在成長期間所內化的中國民族認同，使他們運用一個涵蓋中國與臺灣的歷史敘事，將過去與現在、未來聯繫起來，以理解自我、世代、與行動的意義與價值。

四、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一九七八年底，美國突然宣布即將在一九七九年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且與臺灣斷交。當時臺灣正舉辦「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舉」，有許多黨外候選人參加。但是這次選舉因為美國與臺灣斷交而停辦，黨外因此失去了在體制內推動改革的重要管道。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黨外在高雄市舉行「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與遊行。由於國民黨的干擾壓制，引發黨外及其支持者與警察、憲兵的嚴重衝突。隨後黃信介等許多重要的黨外領導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並且被判刑入獄。由於這次的紀念大會與遊行，是黃信介等人所主持的《美麗島》雜誌社所主辦，因此這個事件被稱為「美麗島事件」或「高雄事件」。在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運動逐漸激進化。

七〇年代的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其反對運動，但是在實際的行動目標上，則以保衛臺灣為目的。從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席位到一九七九年與美國斷交，臺灣社會面臨的一大政治問題，是在外交孤立與中共漸增的威脅下，如何能以中華民國之名，在國際社會中繼續生存下去。這也是激發當時黨外運動的許多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黨外人士即使懷抱中國民族認同，但是他們的國家選擇，最多是沒有排除一個可能涵蓋臺灣與大陸的「未來中國」而已。他們迫切關心的是如何確保「臺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美國與臺灣斷交後到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呂秀蓮（一九四四—）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是上述黨外理念的最清楚的表現。

一九七一年夏天，呂秀蓮在美國獲得比較法學碩士後回臺灣，於同年底開始提倡「新女性主義」，相當活躍。這段期間的她，與一般戰後世代知識分子一樣，懷抱著鮮明的中國國族認同，自認為是生長在臺灣而「接受了二十多年正統中國教育的女孩」，並且認為她所推動的新女性主義承接了清末民初的中國婦女運動（呂秀蓮一九七四 a：四、三六一—四一、二〇六）。她曾經表達自己的國族認同，認為自己「生為中國人，死必為中國鬼」，因此「努力於使自己做一個中國人」（呂秀蓮一九七四 b：三）。但是呂秀蓮倡導新女性主義的活動，不斷受到國民黨的壓制。她逐漸接觸到以往所未見而關於臺灣的史籍，體認到自己與其他對臺灣歷史都缺乏瞭解，

於是開始整理資料與寫作。對於臺灣過去的重新認識，使她「深覺婦女的本質問題與臺灣人的歷史命運有許多若合符節的地方」（呂秀蓮 一九七九：六三）。一九七八年底，她以黨外候選人身分參加「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並且出版了《臺灣的過去與未來》。這本書，也像黃煌雄的著作一樣，顯示七〇年代的黨外將現在的自我與社會置於過去與未來之間，依賴一個特殊的歷史敘事來思考自我的認同與行動的意義。與黃煌雄的著作相比，呂秀蓮的這本書應該是七〇年代黨外特殊而強烈的歷史感最有系統的呈現，也是回歸現實世代當中對於「去流亡」歷史觀最極致的闡述。

在《臺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中，呂秀蓮指出過去有關臺灣歷史的著作絕大部分都站在中國正史的角度，不曾以臺灣本土作主體。因此她決定「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的立場，只單純地站在臺灣本土以及居住在臺灣本土的人民的立場」。她認為，臺灣的過去是一部充滿移民與殖民過程的開發史。移民者在臺灣尋找安身立命之地，能「與臺灣認同，老死臺灣」。但是殖民者卻搜刮剝削，壓榨人民，不認同臺灣，遇到危難則逃離臺灣。她指出西班牙、荷蘭、明鄭、清廷與日本都是殖民者，都是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外來政權」（呂秀蓮 一九七九：五八一—五九、一〇五一—一〇六）。她強調「臺灣歷史的基本特色是，它是一段三百年來沒有主權，身不由己，任人擺布的悲慘歷史！」（呂秀蓮 一九七九：一〇八）。她認為，臺灣在國際上孤立、前途危險之際，島上的人民必須「當家做主」，擺脫如同孤兒、養女的歷史悲運，爭取對土地與政府的主權，自立自救。她強調，「臺灣島上的住民無所謂本省外省之分，只有移民先後的同而已，凡是認同臺灣，願意與臺灣共存亡而同甘共苦的都是臺灣人」（呂秀蓮 一九七九：六一、一〇五、一〇七、一六一）。

呂秀蓮認為，愛臺灣就是愛中國，臺灣人當然屬於中華民族，臺灣歷史也就是中國歷史（呂秀蓮 一九七九：一六六一—一六七）。不過她在政治上的現實主張是未來的「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她呼籲國民黨體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事實，放棄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堅持。呂秀蓮明白提出「中華民國獨立」的主張，認為可以「直接宣布臺灣獨立」，或以「兩個中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方式進行（呂秀蓮 一九七九：二二一—二二三、二四一）。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之前不久出版的《臺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如同前述，是黨外歷史感最有系統的呈現，也是當時對「去流亡」歷史觀最強烈的陳述。這本書既是七〇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重要尾聲，也是八〇年代激進化的黨外所提倡的「臺灣意識」的先聲。呂秀蓮的歷史觀與「中華民國獨立」主張，預示了美麗島事件之後、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宣揚臺灣意識時所闡述的臺灣史觀、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以及獨立建國的主張。七〇年代本省籍的回歸現實世代所挖掘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新文學、以及黨外的臺灣歷史探索的貢獻，就在於提供、準備了八〇年代後臺灣史觀、臺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情節所需的材料，亦即那些在戰後社會公共領域中被忽略、排除、壓抑的臺灣的種種過去。

結論

從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後，臺灣的戰後世代是在和平時期的社會繁榮穩定中透過學校正式教育而充分接受國民黨的國族認同教化的第一代。不僅對外省籍、也對本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而言，這樣教化的結果相當顯著而有效。發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以及黨外新生代，都顯現清晰的中國國族認同，這反映相關歷史敘事對他們的形塑作用。這與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國族認同雖有不同，但是他們挖掘臺灣的過去，重視現實與鄉土，構成八〇年代之後政治、文化本土化、臺灣化的源頭。

從臺灣晚近政治、文化本土化或臺灣化的發展來說，啟動近四十年來這種歷史趨勢的重要時期，正是七〇年代。²¹對當代臺灣政治影響重大的臺灣民族主義在島內的發展，主要在八〇年代之後。七〇年代發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以及黨外新生代，逐漸超越他們在六〇年代成長期所形成而追求「現代中國」的國族認同，突破它所限制的視野，推動一種「去流亡」的文化政治，因而挖掘「鄉土臺灣」的過去，關懷「鄉土臺灣」的現在，審視臺灣的未來。他們對文學與歷史的建構，有助於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意識」、「臺灣史觀」、以及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對晚近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臺灣化」影響重大。八〇年代政治、

文化界的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建構，承襲了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所挖掘關於臺灣的種種過去，以做為敘事情節的現成素材。但是八〇年代之後的這種新的歷史敘事建構，揚棄了中國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而從新的敘事主體位置，賦予這些素材新的意義，成為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²²探討臺灣戰後歷史「軸心時期」（七〇年代）的「去流亡」的文化政治，亦即「軸心世代」（回歸現實世代）的文學與歷史建構，對於我們瞭解晚近臺灣文化與政治的變遷，相當的重要。

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主編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註釋

1 本文根據筆者的專書《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蕭阿勤 二〇一〇）與論文「The Emergence of De-Exile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Generation in Taiwan」(Hsiao 2014) 改寫而成。本文曾發表於「爭取民主的年代」研討會（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五日，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承蒙與談人黃美娥教授批評建議，謹此誌謝。

2 這裡「軸心時期」的概念，借自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雅斯培以「軸心時期」來形容人類歷史從西元前八百至兩百年——尤其是西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這段時期。當時在中國、印度與西方，人們開始反思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而在三個地區幾乎同時發展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雅斯培認為：「這個時代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其範圍內思考的基本範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生活的世界宗教的開端。……這個過程的結果是：到那時為止被無意識地接受的觀念、習慣與環境，都受到審察、質疑與清理。一切都被捲入漩渦。就那些仍然具有生命力與現實性的傳統內容來說，其表現形式被澄清，因而也就發生了變化」（Jaspers 1953 [1949]: 1-2）。筆者認為，就七〇年代的政治、文化變遷的性質，以及對其往後社會的重大影響而言，它在戰後臺灣歷史上，猶如雅斯培所認為那段西元前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樣。因此筆者以「軸心時期」來形容七〇年代的重要性。

- 3 「日據」、「日據時期」，是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社會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習慣用語。本文的研究針對一九七〇年代，因此在文中常使用「日據」、「日據時期」，以反映當時的歷史脈絡與用語習慣。但是視行文所需，也交替使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等詞。
- 4 「表一」的要素，是筆者按照 Hayden White 所討論的敘事特質整理所得。White 指出，一個敘事是以時間的演進為中心而建構的；它有一個中心主題，一個有清楚開始、中間、結尾的情節，一個可以確認的敘事者的發言角度與意見；而且它把不同的事件聯繫起來，同時提供一種結局、結論、決心或解決的方案 (White 1987 [1980]: 9-21)。
- 5 關於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文化建構，參見筆者的另一本專書《蕭阿勤 二〇一一》。
- 6 Breuilly (1993: 2) 指出，做為一種政治信條，一個民族主義者為了正當化其行動所提出的論證，通常是基於下列三項信念：(一) 存在著一個具有明顯而特殊性格的民族；(二) 這個民族的利益與價值高於其他的利益與價值；(三) 民族必須盡可能獨立自主，而這通常至少要獲得政治主權方可能達到。
- 7 從戰後到七〇年代之前，這個世代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文獻，可以參考下列文章的整理：傅博 (一九八七)、松永正義 (一九九〇)、許俊雅 (一九九四)。
- 8 《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在發行前即遭官方查禁。因此那些親身參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年長世代在這次較集中的公開討論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也就突然停止 (傅博 一九八七：一〇七一—一〇八；許俊雅 一九九四：二一三)。
- 9 見王錦江 (王詩琅) (一九六四)、葉石濤 (一九六五)、吳瀛濤 (一九七一、一九七二)、黃得時 (一九七二)。
- 10 陳少廷發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之前，亦即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已在《大學雜誌》刊登〈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智識分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一文 (陳少廷 一九七二)。這應該也是回歸現實世代最早公開討論日據時期臺灣人非武力抗爭的政治社會運動的一篇文章。
- 11 這是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發表的四個月前，陳少廷在另一篇主張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文章中所說的話 (陳少廷 一九七二b：九七)。
- 12 這兩套書是李南衡主編 (一九七九) 的《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五卷)，以及鍾肇政、葉石濤主編 (一九七九) 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八卷)。後者在八〇年代初又接著出版四卷，亦即羊子喬、陳千武主編 (一九八二) 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九至十二卷。
- 13 亦即《文學季刊》(一九六六一—一九七〇) 與《文學雙月刊》(一九七一)，它們也都由尉天聰及其同仁所主持。
- 14 這段談話，見李昂 (一九七五：八十四，一九七六：六三一—六四)，又見楊青矗 (一九七八：一六一—一六二)。
- 15 一九五二年出生的吳念真所導演的自傳性電影「多桑」(一九九四年上映)，其中正有涉及這種歷史經驗的情節。這部電影藉著父親 (多桑) 與子女的衝突，描寫這種涉及國族認同的世代關係，既生動又深刻。

- 16 《立法院公報》六十四(十六)(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六。
- 17 《立法院公報》六十四(十九)(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八。
- 18 《立法院公報》六十四(十九)(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一三一—一四。
- 19 參見黃煌雄接受鄭南榕訪問時的談話(鄭南榕一九八二:七)。
- 20 參見向山寬夫(一九九九(一九八七):七九一)。
- 21 參見 Jacobs (2005)、Hsiau (2005)、Makelham and Hsiau (2005)。
- 22 關於這方面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之後的聯繫與轉折,以及在這種變化過程中本文論及的一些人士在國族認同與歷史建構上的轉變,可參考筆者先前對當代「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研究(蕭阿勤 二〇二二)。感謝黃美娥教授提醒這一點。

引用書目

- 王杏慶等,一九七一,〈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大學雜誌》四十七:二三。
- 王拓,一九七八(一九七七),〈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見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一〇〇—一二九,臺北:遠流。
- 王紘久(王拓),一九七三,〈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文季》一:七六—八二。
- 王錦江(王詩琅),一九六四,〈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臺灣文藝》一(三):四九—五八。
- 包青天(包奕洪)、張景涵(張俊宏)、張紹文、許仁真(許信良),一九七一,〈臺灣社會力的分析(上)〉,《大學雜誌》四十三:三十二—三十五。
- 史君美(唐文標),一九七三,〈來喜愛鍾理和〉,《文季》二:六〇—七六。
- 向山寬夫,一九九九(一九八七),《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楊鴻儒等譯,臺北:福祿壽。
- 羊子喬、陳干武(編),一九八二,《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九—十二卷,臺北:遠景。
- 何欣,一九七三,〈歐陽子說了些甚麼〉,《文季》一:四三—六〇。
- ,一九七九(一九七七),〈中國現代小說的傳統——一個史的考察〉。見何欣,《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頁一—四十二,臺北:遠景。
- 吳瀛濤,一九七一,〈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一)〉,《幼獅文藝》二二六:二七四—二八二。
- ,一九七二,〈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二)〉,《幼獅文藝》二二二:五四—六〇。

呂正惠，一九九五（一九九二），〈七、八〇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見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頁四九—七三，臺北：新地。

呂秀蓮，一九七四 a，《新女性主義》，臺北：幼獅月刊社。

——，一九七四 b，《尋找另一扇窗》，臺北：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書評書目出版社。

——，一九七九，《臺灣的過去與未來》，臺北：拓荒者。

李昂，一九七五，〈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問〉。《書評書目》二十四：七四—八七。

——，一九七六，〈群像——中國當代藝術家訪問〉，臺北：大漢。

李南衡（編），一九七九，〈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五卷，臺北：明潭。

林正杰，一九七八，〈我的政治見解：黃煌雄訪問記〉，《這一代雜誌》十五：五三一—五七。

林載爵，一九七四，〈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文季》三：一三三—一六五。

林濁水，一九七九，〈臺灣是美麗島〉，《八十年代》一（四）：二〇—二四。

松永正義，一九九〇，〈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新地文學》一：三二—五一。

侯健，一九七八，〈「軍中文藝」與「學院派文藝」〉。見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回顧》，頁一六八—一七一。臺北：龍田。

唐文標，一九七三，〈詩的沒落：香港臺灣新詩的歷史批判〉，《文季》一：二—四二。

高上秦（高信疆），一九七六（一九七三），〈探索與回顧——寫在「龍族評論專號」前面〉。見趙知悌編選，《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頁一六二—一七一，臺北：遠行。

——，一九七三，〈慢幕掩飾不了污垢：對現代主義的考察，兼評歐陽子的「秋葉」〉，《文季》一：六一—七五。

——，一九七八，〈西化的文學〉。見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頁一五五—一六六，臺北：龍田。

張良澤，一九七三，〈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二：四八—五九。

張俊宏，一九七七，〈我的沉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臺北：作者自印。

——，一九七八，〈國民黨往何處去序文：支配者亦是競爭者？〉，《這一代雜誌》十四：五一—五二。

許俊雅，一九九四，〈「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概況〉。見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頁一—三六，臺北：文史哲。

陳少廷，一九七一，〈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智識分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大學雜誌》四十三：四—八。

——，一九七二 a，〈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五十三：一八—二四。

——，一九七二 b，〈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大學雜誌》四十九：九三—九九。

陳映真，一九七八，〈從「西化文學」到「鄉土文學」〉。見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頁一七二—一七八。臺北：

龍田。

陳翠蓮，二〇〇二，〈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九（二）：一四五—二〇一。

傅博，一九八七，〈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文星》一〇四：一〇七一—一四。

黃春明，一九七三，〈莎啞娜啦·再見〉，《文季》一：九七一—三二。

——，一九七八，〈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夏潮》二十三：五七一—六二。

黃得時，一九七二，〈臺灣光復前後的文藝活動與民族性〉，《新文藝》一九〇：三七—四七。

黃煌雄，一九七六，〈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臺北：作者自印。

——，一九七七，〈臺灣抗日史話〉，臺北：作者自印。

——，一九七八 a，〈國民黨往何處去？〉，臺北：長橋。

——（編），一九七八 b，〈被壓迫者的怒吼——蔣渭水先生選集〉，臺北：長橋。

——，一九七八 c，〈革命家——蔣渭水〉，臺北：長橋。

——，一九七八 d，〈一項莊嚴的建議——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四十七週年〉，《這一代雜誌》十二：一九—二一。

楊青矗，一九七八，〈筆聲的迴響〉，高雄：敦理。

楊逵，一九七三（一九三七），〈模範村〉，《文季》二：一〇五—一四二。

葉石濤，一九六五，〈臺灣的鄉土文學〉，《文星》九十七：七〇—七三。

——，一九八七，〈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趙知悌，一九七六，〈序〉。見趙知悌編選，〈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頁一一—一三，臺北：遠行。

劉若君，一九七三，〈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文季》二：七七—八一。

鄭南榕，一九八二，〈「真有力」的政治思想家——黃煌雄：訪問黃煌雄〉，《政治家》二十六：六一—二。

蕭阿勤，二〇一〇，〈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第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二〇一二，〈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

鍾理和，一九七三（一九五九），〈貧賤夫妻〉，《文季》二：八二—九〇。

鍾肇政、葉石濤（主編），一九七九，〈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八卷，臺北：遠景。

Brennly, John, 1993,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b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siau, Achin (蕭亞勤), 2005, Epilogue: *Beruhua*——An Endeavor for Normalizing a Would-Be Nation-State? pp. 261-276 in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huia*, edited by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 2014, "The Emergence of De-Exile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Generation in Taiwan." *Oriens Extremus* 52: 173-214.
- Jacobs, J. Bruce, 2005, "Taiwanization" in Taiwan's Politics. pp. 17-54 in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huia*, edited by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Jaspers, Karl T., 1953 [1949],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u, Joseph S. M. (劉宗強), 1983, "Echo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Hsiang-t'u* Fiction." pp. 135-150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U.S. Policy*, edited by Tien Huang-mao.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 Makeham, John, and A-chin Hsiau (韓匡強), eds., 2005,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hui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White, Hayden, 1987 [1980], "The Value of Narrativ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pp. 1-25 in his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 / 黃煌雄編.--初版.--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10

面；公分.--(遠足新書；7)

ISBN 978-986-95322-9-7(平裝)

1.臺灣史 2.臺灣民主運動 3.文集

733.286

106016565



遠足文化



讀者回函

遠足新書 07

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

策畫・台灣研究基金會 | 台研會董事長・江東亮 | 編輯委員會 | 召集人・吳密察 | 編委會委員・許雪姬、何義麟、許佩賢、李福鐘 | 編委會執編・陳怡蓉 | 特約編輯・黃義雄 | 責任編輯・龍傑娣 | 美術設計・賴佳韋 | 校對・楊俶儻 | 排版・菩薩蠻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 出版・遠足文化 第二編輯部 | 社長・郭重興 | 總編輯・龍傑娣 |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曾大福 | 發行・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電話・02-2218-1417 | 傳真・02-8667-2166 | 客服專線・0800-221-029 | E-Mail・service@bookrep.com.tw | 官方網站・http://www.bookrep.com.tw | 法律顧問・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 印刷・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 初版・2017年12月 | 定價・580元 | ISBN・978-986-95322-9-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